



写给雷达

当代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于2018年3月31日下午3时辞世。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参与者、研究者，雷达先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审美趋向都有过宏观辨析和症候分析，尤其对现实主义作品有着超前的发现力和推动力，三十多年来常常率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的现实主义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1999年起热心支持“《当代》文学拉力赛”，2004年后积极参加“《当代》长篇小说年度评选”。他的文学视野、文学理念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及判断，代表了一个时代批评家的高度和水准。

为了《跳跷板》，我最早的一个千字小说，发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解放军报》副刊，我已经忘了我当时的笔名，但忘不了雷达的评语：只有五行字，三个指头盖得住，却三十多年盖不住。

为了2002年10月的一个雾蒙蒙的下午，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高级研究班进修，同学陈继明带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盛名之下的雷达：旧沙发，小茶几，千年以上的断砖、残瓦、陶罐，陪我聆听教诲；他木刻阴沉的黑脸，浑厚磁实的声音，持续地盛在一只心灵里，一面镜子中。

为了一句话，他说：麦家，作家是写出来的，你已经到写出好作品的年纪，我等你的好作品来见我。

为了《解密》，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奇形异状，陌生的图案色彩令人目眩，有人怀疑这是涂鸦，雷达说这是黑马，一言九鼎，登上当年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

为了《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不到两千字，我在一年多后无意中从网上看到：我感激这种相逢，在人车拥挤的时间、空间，一条冷巷，一枝玫瑰（带刺的）静静地为我绽放。

为了一个劝告：我觉得，如何多一些“人间气”和“血肉感”，对麦家也许是重要的，毋庸置疑，这对我是精准的慈悲，我急需的照耀。

为了文学，业如其名，他是中国文学的“雷达”，一辈子的等待，一辈子的守卫，忠诚和坚持折射出他超人的天赋和爱。

为了正直，听说他有一种战士的精神，子弹时刻上膛，随时可能对“敌人”射击。

为了清脆，听说他有一颗孩童的心，天真，明亮，脆弱，简单，乒乓球都找得到他内心的钥匙，因为那里面没有结构，镜面一样平坦、亮堂。

为了八十岁，这是现在北京人的基本寿命，他过早闭紧了眼帘，再也见不了黎明的曙光。

为了这一切，今天我很悲伤。我正在写一部对我来说罕见地具备“人间气”和“血肉感”的新作，也許不久即可交付读者，但它已遇不到那双眼睛：灵敏，犀利，宽广，精确，带着体温的，附着法力的，“雷达”一样的。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减弱我的悲伤，我只知道写下这些是方式之一。除此外，我也愿意采用其它方式，让酒渣色的悲伤，像酒精一样随风飘散。

别了，雷达老师，你足可安心去，因为你的过往精彩纷呈，你的去向只有一个地点：天堂，那里仍有文学的——不是有人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同时也要谢谢说这话的人——博尔赫斯——借给我减弱哀痛的灵感和样式。

2018.4.1

发。

雷达先生上周六去世，从朋友圈里获此噩耗后，我感到十分震惊，心里也十分难受。虽然，我与雷达算不上是师生关系或者是乡友挚友，但我从1995年底走上长江文艺出版社领导岗位之后至今的22年，与雷达先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长江社工作的全力支持，我一直感佩在心。于今，中国文坛的老水手，理论批评的“雷达”遽然离去，我与他相交的历历往事不由涌上心头。

1996年的1月6日，我们在北京“文采阁”举行二月河部长历史小说《雍正皇帝》研讨会。当时，陈建功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作协创作研究部的主任，雷达是副主任，作协创研部的雍文华、吴秉杰、季红真、胡平、牛玉秋都来了。在这次会议上，评论家们对《雍正皇帝》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雍正皇帝》是“五十年乃至百年不遇的优秀长篇历史小说”。这种观点虽然是评论家丁东一提出的，但与会的专家对这部作品无疑都是持肯定态度。当时，雷达已经是国内较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们的出席，代表了中国作协对这部作品的肯定，无疑更有权威性。雷达在会上指出，《雍正皇帝》通过大量细节的呈现，充分展现出当时的历史文化氛围，是这部小说获得成功的



雷达先生生前

重要因素。”通过这次会议，经过媒体的广泛宣传，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开始受到市场的关注和文化界主流声音的肯定。

因为这次会议，我社与中国作协创研部有了密切的联系。后来，我们便计划出版一套反映中国文学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年度选本。双方一拍即合，陈建功主任委托雷达先生具体负责此项工作。1996年的7月26日，我与社总编室的刘学明同志一并到当时尚在沙滩办公的中国作协创研部与雷达签署了合作协议。并确定由雷达同志负责拟定“编选说明”，每年的稿件作协研究员选定后交他终审。这套中国文学作品年选，从1995年开始出版，至今已23个年头了，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套丛书。

雷达在“编选说明”中写道：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

这年的11月25日，我们与中国作协创研部在湖北武汉和宜昌联合举行了一次长篇小说研讨会。这次会议，在中国作协的组织下，共有十几个作家来了。如阎连科、张抗抗、毕淑敏、二月河、赵政、关仁山等。创研部由雷达带队，研究员季红真、牛玉秋、胡平等来了。出版社在武汉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宴会，省委宣传部部长王重农和出版局局长等领导都出席



中为王重农，右为雷达先生，左为二月河

■罗伟章

怀念雷达先生

雷达先生辞世，中国文学界，尤其是文学批评界，倒了一座山。

还在念大学时，就知道有个雷达，老师说，这人是中国文学的“雷达”。是指他的敏锐和确当。而他自己，曾多次在口头上和文字里，说他不喜欢雷达这个笔名，说这个名字给人工具化的印象，仿佛在窥探什么。读雷老师的文章，更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他从未把文学批评当成工具，而是当成信念。他的批评是水性的，阔大、渊深、充满质感，其筋骨和稳固的精神内核，是在浩瀚和圆润中成就的，是以理服人，是山一般自然的挺立。他创造了那么多新概念，确立了那么多新观念，但在他的文字里，却见不到诘屈聱牙的术语。他对文学现象的侦察，始于嗅觉，成于内化，文学的精进和丧失，他几乎都有第一时间的陈述，他把自己的欣喜和忧虑，第一时间捧给文学界，捧给读者。“雷达”，这个他不喜欢的笔名，却赋予了他一种使命，数十年来，即使晚年身体不好，也没丢掉这个使命。

后来有幸和雷达老师认识。跟他认识，自然是因为文学。十多年前，我发表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中篇小说《大嫂谣》《我们的路》《奸细》等一批作品，雷老师倾心鼓励，说“罗伟章是近年来活跃的同辈当中，分量最重、最突出，最值得关注的作家之一”。就在那段时间，他来四川，我和一个同事请他吃早点，成都的小笼包子，点多了，没吃完，雷老师说：“你忘本了。”他马上说：“你忘本了。”他从我的作品里，读出了生活的艰辛。他这话我至今记得，是

因为我感觉到，一个人，包括一个作家，忘本是容易的，别人忘本也就罢了，作家忘本却是致命的，那种创作的原动力，就可能不复存在，而没有这些东西，作家很难保持精神的强度。

两年过后，《饥饿百年》出单行本，新浪网找我去作个对谈，主持人是雷达老师。开言我表达自己的心情，说“雷老师德高望重”，听了这话，他不高兴了，这样他说他，仿佛他只剩了德和望，而他一直在文学的现场，不仅在现场，还在前哨。由此我明白，雷达老师是多么珍惜“雷达”之名。一个名字就是一种命运，他多么珍惜自己的命运。虽不高兴，却不影响他对《饥饿百年》的喜爱；他的喜爱和评价，始终鼓舞着我。他说：“我现在经常有一个感想，就是那种非常扎实，非常致密，非常独特，非常不可替代的小说越来越少了。罗伟章这个作品恰恰做到了这些。罗伟章想要表达的，不仅是生理上的饥饿，也是情感和思想上的饥饿。他的这部书，使我的心在一些夜晚突然沉重起来，坚硬起来、疼痛起来，又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秉烛夜读的神圣境界，流淌的是一股股青春的血液，激情、颤抖、愤怒，内心中深埋的良知和正义感，突然像乍起的狂风。他的这部小说多么让人感动，我兴奋而且感佩的是，世界上还有这样鲜活和洗炼的文字，还有这样狂跳的心脏，还有这样不屈的道义。”这些话，不管我能不能承担，但我知道自己是多么珍惜。

2015年，我发表了《声音史》，在评论这部小说时，雷老师再次提到《饥饿百年》，说“除了后半

部稍弱，整体上是很精湛的”。对《声音史》，他认为是一部“卓特之作”，是“罕见的佳构”，是“乡村心灵史的绝妙隐喻”，且认为，“我们看《声音史》，不宜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它写了空壳化的乡村如何凋蔽，它的立意其实要深广得多”。他对《声音史》缺点的指证：声音还没有完全化入情节，没有完全起到“因之而起，因之而没，因之再起的与人物命运融合为一的妙用”，我也特别认同，特别服气。他完全是说到了点子上。

平时跟雷老师，并没有特别的交往，去北京开会，倒是常常碰见他，他总是一眼就能认出晚辈，老远就打招呼，而且总是那样亲切。

他是中国文学界定海神针似的存在。

而现在，这个人仙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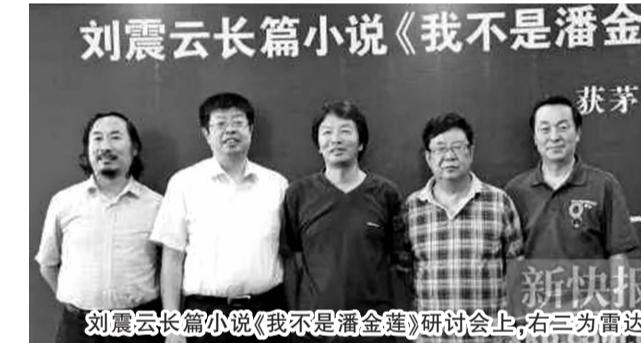
2018年的春天，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人，是很不客气的，春节刚过，就先后传出作家红柯、出版家郎宗培、龚湘海去世的消息，海岛那边，又有李敖、洛夫。其中红柯和龚湘海，是几个月前才一起喝酒的，红柯谈如何锻炼，如何养生，也谈他们老家方言生动的表达力，龚湘海说想出版我一部小说。现在，又是评论家和散文家雷达老师了。

雷老师一路走好。

仙逝的各位师友，一路走好。同时，祝愿活着的各位，都保重身体，写出杰作。十余天前，上海作家姚鄂梅，有感于文朋师友一路倒下，发来短信：“老罗，我感觉自己还没长大，收割机就开过来了。”祝愿那收割机不是别人驾驶，是各位自己掌握着方向盘。

析：

《一句顶一万句》仿佛又回到了《故乡天下黄花》的关注点上。从哲学上讲，比黄花要深刻了许多。它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写起，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它的不同凡响在于，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他的叙述也有魔力，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语句简洁、洗炼，是连环套式的，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他写的似乎是农民，其实是全民族的；探究全民族的精神困境，找到集体无意识，千年孤独。



《一句顶一万句》后来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这个奖项上，长江文艺出版社是继《张居正》后第二次获得此殊荣。从第四届到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奖，雷达先生都是终评评委，我们能有两次获奖，与他熟悉我们的作品，与他那重要的一票是分不开的。

很有意思的是，阿耐的网络长篇小说《大江东去》出版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在这个会上，有一位与会的嘉宾，对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当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但雷达先生并不这样看，他曾撰写了一篇推介文章，对这部作品给了以客观的评价。

本书特别擅长对经济活动的描写，而且语言精准、紧凑干净。看了很多写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结的作品，都缺这个东西，因为作者本身对经济不熟悉，但《大江东去》不同，作者很懂经济生活。这本书里提供了很多经济生活的细节。

雷达的文章后来在北京的重要媒体发表，对于这部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此后该书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最后一次见到雷达先生，是2015年1月7日，长江文艺出版社举行“《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暨《新世纪作家文丛》启动仪式”。雷达先生与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同志都出席了在现代文学馆召开的这次会议。当时，雷达与我坐在一起，见了面，与往常一样，亲切地询问我的近况。会上，时任创研部主任向阳代表作协发了言，会后，我与编选中篇小说的牛玉秋合影留念，并且与创研部的同志包括雷达一起共进午餐，但万万没有想到雷达先生这样快就会离开了我们。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开朗的、幽默的忠厚长者，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别车杜”。他是雷达，但他是雷达的“天眼”。中国文学需要“天眼”，他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



雷达先生出生在甘肃天水，那儿属于黄河流域，作为一个出版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一个在长江之滨的出版社，我仅以长江的名义，向黄河的女儿雷达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河汉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雷达先生在天之灵安息！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有他的煌煌8部著作作为证，历史，将会永远铭记这位文学界的“雷达”。

第13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稿启事

为繁荣文艺创作，培养发掘文艺人才，《作家报》已成功举办12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先后得到了中共山东昌乐县委、千榕家纺集团、北京世华园、山东长星集团、浙江中南百草原集团、河南青天河风景名胜区、山东青州九龙峪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平遥古城、江西南昌蒋巷等的大力支持。应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爱好者的要求，决定即日起启动第13届“作家报杯”全国文学艺术大奖赛征集活动。具体事宜如下：

一、大奖赛分文学类、艺术类。文学类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等；艺术类设特等奖、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等，并设组织奖等。均颁发奖杯（章、牌）、奖品、证书。

三、来稿体裁为：文学类（小说、诗歌、散文、散文诗、评论、报告文学、剧本，5000字、100行内为宜）；艺术类（书法、绘画、摄影、篆刻，1至3件）。均应为从未发表过的作品，艺术作品应为原件。学生作文、长篇作品及专集专著（含已正式出版者）另外开设奖项。

四、来稿请一定注明“第13届作家报杯”字样，并写明作者固定通讯地址、邮编、电话、电子邮箱、简介（附一张生活近照）。本报将陆续辟出专版专栏并出版大赛特刊择优刊发（拟占此专版者可享特惠）；1万字以上参赛作品可收入丛书合集或专集出版。

五、免收参评费。每件只收取通联费及大赛专刊费50元（港币80元）。参赛作品一律不退。

六、即日起到2018年3月底为征稿时间；凡受邀者，截稿时间延至2018年4月底（均以邮戳及信箱时间为为准）。本次比赛4月中旬揭晓，5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届时另行专函通知。

欢迎各届有识之士参与加盟、赞助支持大奖赛活动。独家赞助单位享有大赛冠名权。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瑞都国际（北区）
2-0606室
邮编：101121
垂询电话：010-61507559
18510072519
收稿（款）人：作家报社
房荣丽
专投信箱（E-mail）：
zjbs1966@163.comcom